

故宫武英殿里的清宫往事

周乾

武英殿坐落在故宫的西侧。明代时,这里主要供皇帝斋戒居住,也用来召见大臣商议国事。到了清代,武英殿成为皇家刻书机构,即后来的武英殿修书处。这组建筑分前后院落,院落西北角还有一座阿拉伯式风格的浴德堂。武英殿东梢间设有露房,即清代的西药房。在清代,武英殿院落里还是活字印刷的场所,刊印大量皇家典籍,敬思殿曾用作殿本书籍,书版的库房。

康熙擒鳌拜

“康熙擒鳌拜”是清代一个著名的历史事件。鳌拜是清初开国功臣,受顺治遗诏,为四大辅政大臣之一,辅佐年少的康熙执政。然而,亲政后的康熙不满鳌拜,因而设计要将其擒拿。《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》(卷29)载:康熙八年(1669)五月十六日,“谕议政王等拏同辅臣公鳌拜等”。

康熙八年五月十六日,鳌拜由西华门进入紫禁城,准备前往武英殿向康熙皇帝奏报事务。在鳌拜行至武英门的途中,接到康熙密令的侍卫突然行动,将鳌拜当场抓捕。鳌拜被捕之后,随即被押送到武英门。康熙在武英门对鳌拜进行审讯,并作出处置裁决。因此,鳌拜实际被捉拿的位置,应该是在武英门附近。

抓鳌拜时,康熙皇帝并不在现场,而是在武英门等候。鳌拜被捕之后,身上被套上铁链,被押到武英门,跪在康熙皇帝面前。根据满档案记载,康熙在武英门当面质问他:“先前尔为斩杀苏克萨哈,攘臂强奏云,‘嗣后如我等犯有同罪,主子亦应下令正法’。尔今尚有何言?”鳌拜只是叩头,称自己已经年迈,恳求主子饶过一命。康熙帝让松开鳌拜身上的铁链,命以欺君擅权、结党营私罪免死圈禁。不久,鳌拜就在囚禁的地方死去。

那么,康熙为何要擒鳌拜呢?康熙8岁登基,鳌拜身为辅政大臣之一,手握重权。他行事专断,随意处置朝中大臣,威胁皇权。康熙虽名义上已亲政,但鳌拜党羽遍布朝野,直接对抗风险极大。为除掉鳌拜,康熙暗中挑选少年侍卫,借练习布库的名义秘密训练。康熙八年,16岁的康熙亲率侍卫入宫觐见,命侍卫将其抓捕,由此收回大权,真正掌控朝廷。

露房就是西药房

康熙时期,受西洋医学影响,西药成为宫中医药新事物。用于存储、制作药露的“西药房”相应设立,其在清代档案中被称为露房。

“药露”一词较早见于熊三拔(1575—1620)编译的《药露说》,主要指蒸馏香料类植物过程中产生的药用精油或纯露。而关于露房的人员配备及职能,清代官员姚元之撰《竹叶亭杂记》载:“武英殿有露房,即殿之东梢间,盖旧贮西洋药物及花露之所。”嘉庆朝《钦定大清会典事例二》载:“露房,库掌一员,拜唐阿六名,委署领催一名,医生四名,专司合药蒸露,造鼻烟,及西洋胰子等事。”其中,“拜唐阿”指无品级的杂役人员,“胰子”即肥皂。由此可知,露房位于武英殿的东梢间,内储西药和花露,人员不仅有杂役人员,还有医生,露房除贮存西洋药外,还是制造药露的场所。

露房作为西药房,其中的西药运用史料较为丰富。如据养心殿造办处档案记载,雍正十二年(1734)二月初六日,雍正帝下旨,要求内大臣海望多准备一些巴尔撒木油,用装郑宅茶的锡瓶来盛放,包裹一定要结实牢靠,带给额附策凌军营使用。上述内容说明:巴尔撒木油在军中极受欢迎,喀尔喀副将军策凌请求朝廷大量赏赐巴尔撒木油。这无疑与巴尔撒木油具有良好的治疗刀伤药效相关。

露房不仅用于存储西药,还用于制作西药。如据《清宫医案集成》记载,康熙四十六年(1707)二月,法国传教士张诚等人研制了“龙涎香露”,其配方为:“将龙涎香一两、冰糖一两、麝香二钱五分,三种药研成很细粉状,用一斤玉泉酒露搅拌之,置于银制胆瓶中,再用一个银制胆瓶将口盖封,固定在热炭上,用微火煮三天三夜,将药过滤后,可得龙涎香露九两五钱。”

康熙以后,露房的西药制作量逐渐减少,其“西药房”的功能逐渐退出历史舞台。据嘉庆朝《钦定大清会典事例二》之“内务府二十二·武英殿库作”记载:乾隆三十四年(1769),由于露房蒸露事项减少,四名医生暂被拨回药房。另据《竹叶亭杂记》载:嘉庆于十九年对露房存储的药露进行处理后,“露房遂空,旧档册悉焚。于是露房之称始改矣”。

聚珍印书存史料

康熙十九年(1680),清廷于武英殿设立“武英殿造办处”(后于雍正七年正式改称“武英殿修书处”),武英殿由此成为清代宫廷主要刻书机构所在地,承担内府书籍的刊刻、刷印与装潢。武英殿里刊印的书籍,绝大多数采用传统雕版印刷,将一整页的文字刻在整块木板上,刷墨之后覆纸印刷。不过,武英殿也使用活字印刷,这是它的一大特色:先制作出一个个独立字块,再



武英殿外立面(虚线框内为露房)



故宫藏《武英殿聚珍版程式》刻本



浴德堂浴室内容(局部)

根据需要挑选字块排版,印刷完成后还能拆版,字块可重复利用。武英殿活字印刷的代表作品,是铜活字印制的《钦定古今图书集成》,以及枣木活字排印的《武英殿聚珍版丛书》。

《钦定古今图书集成》由陈梦雷初编。雍正三年(1725)书稿被校改定稿,交由武英殿以铜活字排印,两年后印成。该书目录40卷,全书1万卷,合计约1.6亿字,是我国现存最大类书。它汇编了从上古到康熙朝的多种文献,对研究古代天文地理、制度博物极具史料价值。武英殿动用约30万枚铜活字,但仅印64部书。此书代表了我国古代铜活字印刷最高成就。可惜这批珍贵的铜活字,在乾隆初年被熔毁,另作他用。

以枣木活字排印的《武英殿聚珍版丛书》,由管理武英殿事务的内务府大臣金简主持。金简采用枣木活字印刷术,共刊印书籍134种、2400余卷。这些书大多是从《永乐大典》辑出的宋元时期佚书,总称《武英殿聚珍版丛书》。

金简在《武英殿聚珍版程式》中写过相关往事:乾隆三十八年(1773)十月二十八日,他上折奏请创制枣木活字。若一部部雕版刻印,不

但要耗费大量木板,还要耗费很长时间。他仔细考虑,不如制作一套枣木活字版,用来印刷各类书籍,这套枣木活字版相比整块雕版,人力物料能省下很多。金简依据官方的《佩文诗韵》仔细挑选用字,经书中少见的生僻字就不收录,常用字多备几份字模,大小字合计准备约15万个活字。活字的使用方式很简便,印刷时按照书稿摆放好字模,就能够直接印刷成书。乾隆帝看到奏折后,要求增补活字,最终刻成枣木活字25万余枚。不仅如此,乾隆嫌“活字”名字不好,将其改名为“聚珍”。

浴德堂元代就有

在武英殿的西北角,有一座建筑叫作浴德堂。建筑的前方为殿堂,后方建有一座异域风格的穹顶浴室。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,民间流传着一种说法:浴德堂是乾隆皇帝为回族妃子香妃修建,供香妃沐浴使用。那么这个说法到底是不是真的呢?

明初萧洵《元故宫遗录》记载:“台西为内浴室,有小殿在前。由浴室西出内城,临海子。”观星台的西侧是皇家内浴室,浴室前方还建有一座小殿。从浴室往西走,就能走出内城,抵达海子。浴德堂即为书中描述的浴室,为元代遗存。也就是说,浴德堂在元代就有了,并非乾隆帝专为“香妃”所建。

1914年,内务部古物陈列所设在浴德堂办展,展出从热河行宫运来的无款戎装女子油画,将其定名为“香妃戎装像”,悬挂于浴德堂浴室门楣,并张贴《香妃事略》作为解说词。解说词内容大意为:“香妃是回部的王妃,容貌绝美,天生身上带有异香。乾隆听说后,便嘱咐定边将军兆惠把她俘获送到京城。乾隆修建浴德堂作为她的沐浴之处。可香妃始终心怀故国,太后得知后,便将香妃赐死。”因为这场官方展览,让原本只存在于民间野史的香妃传说,被大众误当作真实历史,广为流传。

据朱家潘考证,这幅画的定名纯属偶然:内务总长朱启钤参观时,随口将其称作“香妃戎装像”,工作人员未核查任何清宫档案,便直接敲定了这个名称。

那么,历史上真的有香妃这个人吗?实际上,香妃确有其人,但名字不叫香妃,而是叫“容妃”。其人生经历和民间传言也完全不同。民国时赵尔巽的《清史稿》(卷220)载:“又有容妃,和卓氏,回部台吉和扎麦女。初入宫,号贵人。累进为妃。”也就是说:容妃,姓和卓,是回部贵族“和扎麦”(注:实为回部贵族阿里和卓)的女儿。她刚进宫的时候,封号是贵人;之后一步步晋升,最后被封为妃。另《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》(卷820)载:乾隆帝称赞容妃端庄恭谨、恪守本分,能恭敬侍奉太后,言行合乎后宫规范。另根据史料记载,容妃因病善终,与“太后赐死”没有任何关系。

综上不难看出,武英殿留存的诸多清代历史往事,具体体现出它独有的历史文化底蕴,也是故宫历史文化体系的重要构成,其建筑遗存与相关资料,值得我们保护与深入研究。

把日子酿成蜜

卜庆洋



菜市场的角落,总能看见张阿姨的身影。她守着一筐沾着露水的青菜,手里织着毛衣,嘴角总挂着笑。有人问她,起早贪黑卖菜多辛苦,怎么还总乐呵呵的?她举起手里的毛线:“你看,这线多鲜亮,织件毛衣给小孙子,每一针都透着甜。”原来,欢喜从不是等来的幸运,而是藏在生活里的“开关”,只待我们主动去按动。

看过这样一个故事:有个年轻人总觉得生活灰暗,便去请教一位智者。智者没说大道理,只给了他一个空陶罐,让他每天放进去一个写着“开心事”的字条。起初,年轻人懊恼刮刮也想不出,后来他开始留意:清晨的阳光落在窗台上,是一件开心事;楼下小猫蹭了蹭他的裤腿,是一件开心事;同事一句善意的提醒,也是一件开心事。久而久之,陶罐里的字条堆得满满当当,年轻人再提起生活,眼里满是光亮。

我们总以为,欢喜需要惊天动地的理由,需要功成名就的铺垫。可实际上,人生的美好,从来都藏在细碎的时光里。就像沈从文行于沅水之上,能从船夫的笑容里看见坚韧,从流水声中听见诗意;就像林清玄在茶烟袅袅中,能从一杯清茶里品出清欢,从一朵花中悟得禅意。心有欢喜的人,从不会被生活的琐碎困住,因为他们懂得给日子“加点糖”。

邻居家的爷爷,退休后学起了书法。起初笔都握不稳,写的字歪歪扭扭,可他从不气馁。每天清晨,他都会在阳台上摆上笔墨纸砚,一笔一画地临摹。阳光洒在宣纸上,墨香弥漫整个楼道。有人问他累不累,他笑着说:“写写字,听听鸟叫,比啥都舒坦,高兴着呢。”如今,他的书法越写越好,每一幅都透着满满的精气神。

生活就像一面镜子,你对着它笑,它便会回你以笑;你对着它愁,它也会回你以愁。同样是面对风雨,有人只看见泥泞,有人却能看见雨后的彩虹;同样是面对平凡,有人只觉得枯燥,有人却能活出诗意。所谓心有欢喜过生活,不是强行忽略生活的苦难,而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,依然选择热爱生活。

朋友小周曾因为压力大而整夜失眠。后来,她开始在睡前写“欢喜日记”,记录当天最开心的三件事。可能是一杯好喝的咖啡,可能是通勤路上听见的一首好歌,可能是下班回家后爱人做的一顿热饭。渐渐地,心态变得平和,脸上的笑容也多了起来。她说:“原来不是生活不够好,是我以前太贪心,总盯着自己没有的,却忘了珍惜已经拥有的。”

人生这趟旅程,难免会有坎坷与荆棘,会有迷茫与焦虑。但请相信,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,都藏着值得欢喜的理由。也许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,也许是午后的一阵清风,也许是夜晚的一轮明月;也许是家人的一句牵挂,也许是朋友的一声问候,也许是陌生人的一份善意。只要我们愿意打开心门,就能看见生活的美好。

就像那位卖菜的张阿姨,能从织毛衣中找到乐趣;就像那位学书法的爷爷,能从笔墨纸砚中找到安宁;就像小周,能从琐碎的日常中找到温暖。心有欢喜的人,永远能在黑暗中看见光亮,在寒冬里遇见温暖。他们懂得,生活的滋味,全靠自己调味;人生的风景,全靠自己欣赏。

9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

《七律·长征》气势磅礴、雄浑壮阔。其中,“金沙水拍云崖暖”一句,精准指向了一场红军长征中的经典战役——巧渡金沙江。经此一役,中央红军主力部队成功渡过天险金沙江,把数十万国民党“追剿”大军甩在身后,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、黔、滇边的计划,从而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重大胜利。

知己知彼,百战不殆。这次战役中,在前线将士奋勇冲锋、勇破天险的背后,负责提供情报支持的侦察队伍亦是功不可没。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情报工作。长征路上,“龙潭三杰”之一的胡底曾因情报工作经验丰富,担任侦察科科长一职,搜集信息、研判敌情,为指挥决策提供依据。

胡底,安徽舒城人,原名胡百昌,又名胡北风。青年时期,他受到马列主义的熏陶,从而萌生救国救民的愿望。1925年,胡底加入中国共产党,积极从事革命活动。长征路上,他所负责的侦察科主要任务有三项:一是调查前进驻地及其附近敌情,包括人员、编制、装备等;二是绘制驻地周围路线图,包括山、水、桥梁、船只、道路情况和距离等,并寻找向导;三是进行社会调查,包括沿途的村庄、人口、房屋、粮食、商店、社团等。

胡底对待工作严谨细致、尽职尽责。每到一地,他都尽最大努力搜集各种情报资料,及时分析整理,送交总部,供研究敌情参考。每接受一项重要侦察任务,他都缜密思考,精心安排,并再三嘱咐侦察员一定要有手准备,以防万一。他待人谦和、虚心务实,尊重同事、下级及政工人员的意见,布置任务时多以沟通商量的方式推进,团队氛围融洽,干劲十足。

原侦察科技术书记刘琦、指导员雷应声(后改名雷钦)均在回忆文章中提到过侦察队伍的亮眼战绩。其中,他们对巧渡金沙江中的侦察工作印象尤为深刻。雷钦撰写的《永远忘不了那座藏民小楼——忆长征途中遇害的胡底》一文提及,中央纵队挺进到昆明附近后,胡底立即派遣侦察员四处展开侦察活动。一次,侦察员潜入昆明近郊敌占区内,阻获了一辆汽车,不仅从车上人员口供中了解到昆明附近的敌情动态,掌握了金沙江江岸渡口的情況,还缴获了急需的军用地图和一部分重要的药品。胡底立刻将上述人员、资料 and 物资一并送交周恩来,为总部决策提供了重要根据。

刘琦在《我所了解的情报战线三杰之一胡底》一文中还提到了侦察队为巧渡金沙江寻找船只的往事。据他回忆,在刘伯承总参谋长布置迅速寻找船只过江事宜后,胡底派张明远和刘琦分别带侦察队前往完成任务。张明远率领4名侦察员,化装成国民党中央军,先是通过沟通控制了南岸渡口仅有的两艘船和14名艄公,之后又乘船过江,一枪未放解除了江北岸税警武装,夺得了江北渡口的两艘船。

胡底临危不乱、沉稳豁达,身担重任仍能冷静研判、灵活应变。这份过硬的心理素质与专业能力,与他长期在白色开展秘密情报工作的传奇经历是分不开的。天津,便是他早年坚守隐蔽战线的重要阵地。

1930年11月,胡底奉命来到天津,创办长城通讯社并任社长。明面上,长城通讯社是国民党情报机关在北方的分支机构,归南京长江通讯社管辖。事实上,它却是中共的秘密情报站。筹备伊始,它设法租界,后迁移到日租界秋山街5号的一幢4层楼内。胡底本人居住在4楼。据钱壮飞表弟、时任长城通讯社编辑的张家璇回忆,当时在天津获得国民党当局的重要情报,胡底都以长城通讯社的名义,用密码电报拍发到钱壮飞处,再转送中共中央。

在天津期间,胡底的工作卓有成效。他和战友钱壮飞、李克农纵横于敌方龙潭虎穴之中,为党的革命工作提供了大量及时的情报,包括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几次“围剿”作战计划,对红军的反“围剿”斗争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。周恩来对他们三人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,称赞他们是“我党初期情报工作战线上的三杰”。

1931年4月,一场突如其来的危机打乱了胡底的潜伏工作。化名“黎明”的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。他向国民党特务机关提供了关于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绝密情报,使党组织面临前所未有的危险。几天后,胡底在天津接连收到李克农和钱壮飞拍来的两份暗语电报,其中一份内容为“克潮病笃”,另一份则为“潮病重速归”。按照他们先前的约定,“克”是李克农的自称,“潮”则是钱壮飞当年做医生时的化名,“病笃”“病重”则预示情况危急,需要迅速转移。

胡底当机立断,撤离天津。后根据中央的安排,前往中央革命根据地。在这里,他主要从事文化教育工作和政治保卫工作。1934年10月,胡底随中央红军,离开江西根据地,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。

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,像胡底这样曾在天津淬炼本领、积蓄力量,而后奔赴长征路的革命前辈还有很多。我们前文提到的侦察科技术书记刘琦,1912年7月出生于天津,幼时因家贫而离乡,新中国成立后,他曾担任天津市交通运输局局长;大渡河战役指挥员之一的聂荣臻将军亦曾在天津、唐山一带从事白区工作;更不用说周恩来、邓颖超,他们曾在天津求学、生活,毫不夸张地说,天津是他们革命生涯的起点。这片红色沃土,虽未亲历长征的硝烟战火,却见证了一代代革命者的初心坚守,承载了隐蔽战线的无声担当。

题图为胡底旧照。